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郭影秋

张瑞霭的传奇人生 张聿温

重温一组老照片 锐明

海校漫忆 叶四临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李荣欣

定格历史 收藏记忆

OLD PHOTOS

老照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照片.第74辑/冯克力主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474-0200-9

I.①老… II.①冯… III.①世界史—史料②中国—现代史—史料
IV.①K106 ②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7786号

- 责任编辑 冯克力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0×203毫米
6印张 113幅照片 12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出版人 郭海涛
主 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王 芳



第七十四辑

目 录

郭影秋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1
张聿温	张瑞霖的传奇人生	32
杨 钢	书里书外的段君毅	51
马小弥	百年曹禺叔	67
吕 恩	影	77
伊 格	角	82
锐 明	重温一组老照片	88
叶四临	海校漫忆	102
田翠芝	在西藏支边的岁月	124
李荣欣	工农兵学员进北大	142

龚玉和	我当“民办教师”	154
王 柔	哦，篮车.....	159
赵海成	1930年代的北京戏曲学校	164
李威言	聊城师范附属小学旧影	171
杨嘉实	在加尔各答候船赴美的中国留学生	178
冯克力	叶四临们的遭际	187

封 二	童年记忆（秦风老照片馆供图）
封 三	少女（谭金土供图）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郭影秋口述 王俊义整理

调新市委

1965年9月12日起，我带领人民大学数百名师生到北京郊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1966年5月上旬，中央组织部的赵汉副部长突然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调动，我经过认真思考后，非常诚恳地向赵汉表示：请转达中央有关领导，能否准予免掉。但是不久，我的请求未被接受，中央明确通知一定要调。

我清楚地记得，5月18日，吴老（吴玉章）特地风尘仆仆地到苏家坨公社看望参加农村“四清”及开展半工半读的师生员工。我陪同吴老参加这一活动后，于5月19日到北京市委报到。已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当天找我谈话，职务是市委书记处的文教书记，分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方面的工作，首当其冲是“文革”方面的事。立即要着手进行的，是接管《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要先摸清情况，清算两报在“三家村”问题上的错误，使报纸尽快以新的姿态投入“文革”之中。6月3日，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



1949年1月，郭影秋任十八军政治部主任时，摄于山东单县。

京市委的消息。正式公布李雪峰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我和高扬文、马力为书记处书记。我作为文教书记，还兼任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华北局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会议。与我这样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郑季翘（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东北局）、杨植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

表西北局）、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代表西南局）。我们这几个人都算不上是“文革小组”的成员，只是边缘人物，且很快都被打倒和撤职了。

我去北京市委报到的前后一两天，大概是5月18日或19日，发生了触目惊心的邓拓自杀事件。邓拓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是党和国家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而今成了“文革”爆发的直接导火线，因撰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被横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他因不能接受这些罪名，又无法正常申辩，便留下遗书，以死抗争，终年才五十四岁。按说，他的死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应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和警惕。北京市委曾为此报告中央。事后，李雪峰曾传达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想不到批示中毛泽东对此竟风言冷语，很不以为然。对此，惺惺相惜，引起我无可名状的悲凉。应该



1949年6月，十八军南下到达江西。部分领导干部在乐平合影。后排左三为郭影秋。

说，我参加革命后，对于毛主席有出自内心的敬仰、热爱和崇拜，而他对邓拓之死有如此批示，如此的铁石心肠，真使我大感意外。由于毛泽东有这样的态度，作为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在一次会议上，在说到邓拓之死及其遗书时，也轻蔑地说：“邓拓的遗书很恶毒，睁眼说瞎话，用他的行动作出结论。遗书坚持反动立场，说过去的一切与彭（真）刘（仁）无关，实则是坚决的包庇。其次，对所有的批判都反对……”从李雪峰讲话所透露出的邓拓遗书的点滴内容看，邓拓确是宁

折不弯的大丈夫。

到北京市委工作后，我参加了原北京市委、市人委副部长以上的所谓“揭发批判彭真及三家村黑帮”的大会。这次会议从5月22日起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议的基调是揭发批判北京市委原来主要领导彭真、刘仁、郑天翔的问题，要求与会者勇敢揭发，同时也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原北京市委的一些干部，如崔月犁、张大中、李琪、韩伯平、张文松、宋硕等都曾在会上无可奈何地作过或揭发、或检查性的发言。有一次会议，还专门安排了原北京市委的三位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作检查，以便过关。

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我在七十多天的工作过程中，花费精力最多、感到最为棘手的，还是派工作组的有关问题。派工作组的导火线，缘于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的副部长宋硕及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珏云，扬言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于当时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的有关情况尚未公布，在此之前党中央、国务院曾经发出过关于贴大字报的指示和规定，如“遵守纪律”、“内外有别”等。因此，聂元梓的大字报张贴之后，既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也遭到了许多北大师生的反击。出人意料的是，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却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随之《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高度评价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因而很快在北京、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当时，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为稳定社会正常秩序，保证“文革”的正常开展，作出了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的决定。据我所知，在此之



1952年8月，川南行署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马孔志、李大章、郭影秋、彭涛。

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就在5月30日向在外地的毛泽东请示，拟派陈伯达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毛泽东于当天就表示：“同意这样做。”当时大家都认可派工作组是顺理成章的事，包括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均未对此提出异议。北大的工作组派出去之后，各方面的情况都紧张起来，各个学校都要求派工作组。一、两天内北京市、华北局和中央工交系统就抽调了四十多名干部，包括中央组织部及其他各部的一些正、副部长，分别到各个大学任工作组组长。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我原以为派出工作组，就可以舒一口气了。但更复杂、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一方面是一些学校的工作组与所在学校的造反派发生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

是中央高层领导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发生分歧。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北京新市委的李雪峰主张派；江青、陈伯达、康生则时刻窥测毛泽东的意图，以求政治投机。他们开始也主张派，后来又看风使舵。我则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斗争的漩涡，甚至成了替罪羊。

1966年7月初，华北局要在北京市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集中讨论“文革”的问题。为此，市委要准备一个大会发言。我和黄志刚根据李雪峰一次讲话精神，先草拟了一个提纲，再由市委简报组起草成文，经过书记处会议讨论，最后由李雪峰、吴德定稿，而后让我在会上代表北京新市委发言，还用市委名义上报中央。这个报告因贯彻了支持派工作组的思想 and 内容，后来被指责为是“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和典型”。我想，这大概是我被撤销“北京市委书记”的根据。但执行“反动路线”的又何止是我呢？“文革”后期，我有病在家休养时，吴德同志曾到家里看望，我曾问他：“我到底为什么被撤职？”他满脸带笑却吱吱唔唔，没有说出所以然。

一次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市委工作时，中央正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5月4日举行至5月26日结束。由于会议进行过程中我才到市委工作，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议的情况我很快就知道了。一则是李雪峰同志在市委的书记处会议上作了正式传达，再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同志参加了该会。而我与万里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从李雪峰的传达和与万里的交谈中，我了解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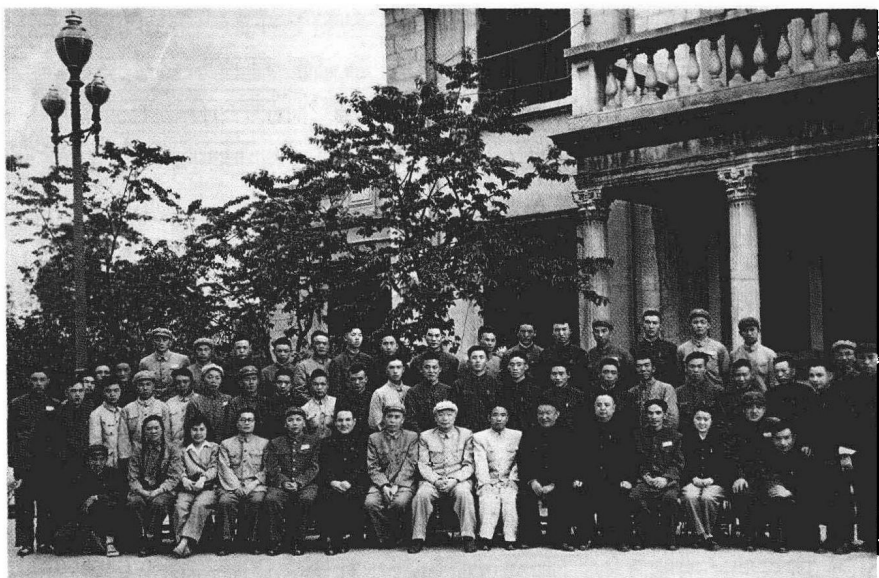


1955年5月，郭影秋陪同周总理会见军区领导人。

整个会议过程中毛主席在外地，由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的中心主题是：其一，传达通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其二，揭发批判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三，讨论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即所谓《五一六通知》）。万里同志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会议的细节。当时，我们两人都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次会议不大正常，主要表现在：第一，因为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会议，由少奇主持会议，中央其他几位副主席都出席了会议，而且这几位副主席都排名在林彪之前。然而，围绕会议主题作主要讲话的却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会议开始的前两个半天，首

先由康生向会议系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及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有关指示；介绍和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起草过程及毛泽东对《通知》的修改意见，以及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的内容。接着由张春桥在会上系统介绍了彭真、陆定一“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陈伯达在会上讲话，提出对彭真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尤其是“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谈古今中外的政变（即被称之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肆意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就是要“搞政变”、“搞颠覆”、“要篡权”。同时不遗余力地大搞个人崇拜。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一万句”之类的话，就是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第二，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彭真、陆定一等人问题的指示后，展开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调门定得极高，罪名都大得吓人，都是按毛泽东那段有名的论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彪又进一步直接演绎，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的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

其他与会者的揭发不得不按这样的调门附和，却不允许被批判者自我申辩。会议虽然安排了彭真、陆定一检查，但彭真在大会上仅仅讲了五六分钟，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名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康生随即摆出一副打手架势，反驳说：“你这个讲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



1955年，聂荣臻到云南。前排左五起：秦基伟、郭影秋、谢富治、聂荣臻、于一川、张冲。

《五一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就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陆定一在检讨中说：他“主观上绝没有想变天”，林彪则马上反驳说：“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第三，林彪在会上抓住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的问题，揪住陆定一大吵大闹。陆定一曾就匿名信问题在会上检查说：“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则反问：“你老婆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

林彪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指着陆定一的鼻子叫嚷：“老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更令人厌恶的是，在陆定一做检查的那天，每位与会者的桌面上，放了一份由林彪签名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处女，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之类的内容。我感到这些都实在不像话，难怪聂荣臻元帅看到桌上摆的林彪手书后，就举着它，十分生气地冲着主席台喊：“发这个干啥，收回！”

康生、陈伯达在工作组问题上的两面派伎俩

6月1日下午，正在市委开会时，李雪峰通报说康生给他送来条子，说当晚中央广播电台要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对此还有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大字报贴出的第二天，5月26日康生与我有一次谈话。他说：“我对聂元梓这个人的印象不好。”但“不管她过去怎么样，批评宋硕是对的”。他还说：“聂元梓作为党委委员、总支书记，贴大字报相当恶劣。他们这样一搞，群众糊里糊涂跟上来，外校也跟上来，就乱了。”这说明康生当时还不得不附和多数人的看法。但他话锋一转又说：“北大会不会乱，很担心。不是担心他们的大字报，而是看北大党委采取什么态度。有两种态度，第一是继续按彭、刘（仁）、郑（天翔）那一套去领导北大；第二条是同彭、刘划清界限，搞新的一套。如搞第一种态度，还做保皇党，就不行。学生不造反，我们就大闹天宫。”所以“乱不乱，不决定于聂和学生，而决定在党委，

关键在这里。”从他的说话看，支持聂元梓的意向明显，却又模糊其词，有保留余地。但在毛主席明确表示了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肯定后，他便雀跃欢腾起来。他曾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要广播聂的大字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

不过，对于是否应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是支持还是反对，直到6月1日还不是很明确。6月1日当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当我进入会场时，已经有几个人在座，因为都听到聂元梓大字报的广播，自然都围绕北大“文革”的事在议论。听说中央决定要派工作组到北大，组长是张承先。正在这时，陈伯达来到会场。我和陈伯达过去虽见过面，说过话，但无任何个人交往，这时才算是第一次正式认识。他听到大家议论向北大派工作组的问题，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

“张承先这个人不大理想，我和他一起做过救灾工作，他身上老是挂着药瓶子，身体不好。最好能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做完这个工作就能留在北大工作（当校长），这样的人最合适。我看要是你能去最好了，你去北大最好。”我随即回答说：“我不能去，北大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再说北京市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摊子事也不少，我还有人民大学的事。”我和陈伯达说话过程中，康生已步入会场落座。大家议来议去，还是觉得就是派张承先了。这样，张承先按市委的通知当晚就带工作组到了北大。

后来，风向突变，起因是工作组与“造反派”产生了矛盾。毛泽东认为派工作组是设置障碍，制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手足，不利于运动的深入开展，对工作组产生反感和不满。



1959年12月9日，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郭影秋陪同陆定一视察南京大学。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到北京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拒绝刘少奇要求见面的请求，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在此期间刘少奇也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过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

接着，毛泽东又于7月24日、25日，先后召集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又曾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先后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途，又说工作组“对运

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虽然事先康生曾指示我要在工作组问题上“揭发刘少奇”，但我在参加所有有关的会议上，在中央高层对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没有说过一句对少奇同志不利的话。我心中也想过，这样做肯定会得罪康生，但做人总应有个起码的底线，绝不能为了保护自己，就看风转舵，去嫁祸于人。康生会对我如何，只好听之由之！也就是在此前后几天内，江青、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员们纷纷到北大、北师大等高校讲话。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喊：“要撤销工作组”，“要罢张承先的官”。康生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7月27日，康生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突然阴险地说：“彭真搞了‘二月兵变’，人大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意思是我参与了“二月兵变”。这可以说是害人于死地的重型炮弹。果然，由于康生的煽动，7月28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便跑到市委请愿示威，要求揪我回人大，扬言不把我交出来，就不回学校。我看到直至当晚8时造反派仍聚集在市委门口不停地高喊要人时，便找吴德谈话，主动要求回学校接受群众的质疑。吴德当即表示：“还是留在这里，不要回去。”但到了晚10时，吴德又来找我：“与李雪峰同志商量，看形势你还是回人大吧！”他还要派军队护送我回校，我没有接受这样的安排，随即通知我的秘书李春景同志乘车回校。

从此我便陷入无休无止的批判斗争之中。北京新市委在雷霆万钧般的压力下，于7月28日作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撤销我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当我听到对我